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PAPD)

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论丛

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汪介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PAPD)

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论丛

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汪介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汪介之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161 - 6496 - 9

I. ①俄… II. ①汪… III. ①俄罗斯文学—现代文学史—文学
批评史 IV. ①I512. 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272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曲弘梅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王 影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25
插 页 2
字 数 463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俄罗斯民族在 20 世纪走过了一条充满探索与困惑、奋进与彷徨、希望与失望、苦难与崛起的道路。20 世纪俄罗斯文学艺术地记载了本民族曲折前进的艰难行程，形象地表现了几代人的追求、痛苦、憧憬和幻灭，提供了一部足以和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相媲美的厚重巨册。20 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既是这一文学巨册的组成部分，又以其对于这一文学的描述与评说而获得了自身特有的价值，以其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价值取向、运思理念、话语建构和言说方式，参与了世界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发端于 1890 年代。从那时起，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特色。由于民粹派运动的失败，晚期封建制危机的加深，俄罗斯同欧洲先进国家的经济文化差距更为明显，因 19 世纪行将结束而产生的某种“世纪末”情绪压迫着知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引发了他们探索民族出路和前途的热情。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包括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尼采的唯意志论在内的以“重估一切价值”为基本特征的西方现代社会哲学思潮的涌入，为俄国思想界、知识界的思考与探索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思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 19 世纪以来的丰厚文学艺术成果，越来越多地被译介到俄国来。这些成果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及其所蕴含的人文主义、民主思想和自由精神，都给俄国思想文化界人士以有力的启示与推动。他们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本民族历史和文化，重新解读与发现本民族的古典作家和思想家，在人文科学和艺术各领域展开了富有开拓性的创造活动，造成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近 30 年间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活跃与极大繁荣。这个时代后来被杰出的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称为“俄罗斯的文艺复兴”（Русский ренессанс）时代。

众所周知,14—16世纪以意大利为发源地、席卷几乎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虽中文译名是“文艺”复兴,其范围却不仅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那是一个科学、哲学、文化和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和高涨的时代,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与此相似,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也出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密集型文化高涨。在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各个学科门类中,都相继涌现了一批造诣颇深、成果卓著、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所创造的思想与艺术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文化的宝库。这也是一个精神觉醒、思维活跃、文化振兴、名家迭出的大时代。“在那个时代的创造高潮中产生的许多东西,已进入俄罗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并且至今还是整个俄罗斯文明社会的财富。”^①可见,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样,这一时期俄罗斯的“文艺复兴”也仅出现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复兴,而且形成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振兴与高涨。

如果说,俄罗斯的“文艺复兴”指的是那一时代所特有的总体精神氛围和思想文化运动,那么,别尔嘉耶夫提出的另一概念“白银时代”(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更多的则是针对这一时代的文学而言的。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既是俄罗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又是这一运动的产物。思想文化领域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哲学、史学、宗教神学、语言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大量著述,艺术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潮、新倾向,都对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等学者兼为作家、诗人、文论家和批评家的现象,各类艺术家同时涉猎文学,在那个时代极为常见,成为俄罗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特殊景观。

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是一个诗歌与理论批评繁荣、小说成就显著、散文和戏剧获得长足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文学生活的重要特点是多种文学思潮和流派相继崛起,文坛的多元格局得以形成。现实主义在继承自身传统、汲取同时代其他艺术流派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情况已不复存在。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等文学流派先后崛起,在题材选择、主题侧重、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上均别开生面,并以其创作实绩迅速取得了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地

^① Бердяев Н. А. Самопознание: Опыт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га», 1991. с. 140.

位。另有一大批作家和诗人不标榜任何“主义”，不是任何一个流派的稳定成员，其创作则分别显示出自然主义、新古典主义或新浪漫主义倾向，同样也是硕果累累，影响显著。在这个时代活跃于文坛的各个流派的优秀作家，都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宝库增添了许多艺术珍品。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繁荣，是与白银时代文学创作的拓展，与这个时代的思想活跃、文化高涨、哲学兴盛及宗教探寻的深入紧密相关的，同时又与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多元格局一样，呈现出多种思潮和流派并存发展、争妍斗艳的景象。哲学和宗教探索热情的高涨，激发了文学批评界理论思辨志趣的增长。哲学以及人文科学各领域内的理论成果，为文学批评家们提供了新的、丰富的思想资源，也给他们以方法论层面的诸多启示。思想家、哲学家、宗教神学家中有很多人直接涉足文学理论与批评，形成甚为独特的宗教文化批评家群体，推出了白银时代极有价值 and 影响的一部分理论批评成果。象征主义作为在这个时代最先出现、颇有成就的文学新流派，在理论批评方面与宗教文化批评的关系最为密切。几乎所有重要的象征主义作家和诗人都留下了自己的理论批评遗产。虽然两代象征主义者的理论观点与批评见解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这一流派的总体理论建树却同它在创作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一样，在白银时代整个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阿克梅派和未来派在理论批评方面同样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如前者关于“美的明确性”的主张，后者关于革新诗歌语言的观点，等等。现实主义理论与批评则与这个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一样，继承19世纪的传统而又勇于创新，显示出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而熔铸一新的特色，它本身同时又是这个时代现实主义艺术实践的理论表现。如果说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批评，多为各流派的代表作家和诗人密切联系各自的创作实践进行理性思索的成果，那么，格尔申松、艾亨瓦尔德、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和楚科夫斯基等人则可称为一批专业批评家。这批专业批评家通过各具特色的批评实践，为人们深入认识白银时代的文学提供了难得的珍贵资料。世纪之交动荡的社会现实、空前活跃而驳杂的思想潮流以及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使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顾及文学理论批评。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沃罗夫斯基等人都留下了不少的批评论著，其中有许多即便今天看来仍有启发意义。

1917年发生的十月革命，划出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前后迥然不同的两个时代。由于对历史的突发性变动和变动后的现实的不同理解，俄

罗斯作家队伍发生大规模分化，白银时代的知名作家和诗人，约有一半在革命后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迁居国外，继续进行创作活动。俄罗斯文学分为两大板块：“俄罗斯本土文学”（其主体部分为“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域外文学”（俄罗斯流亡文学）。两大板块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在国内俄罗斯文坛，自十月革命至1920年代末，由于文学生活氛围一度较为宽松，多种文学派别和团体尚能共存，作家和诗人们在创作题材和方法运用上还可以自由选择和大胆试验，各种倾向和风格的作品得以同时涌现；在理论批评领域，也曾经出现了流派纷呈的多元格局。马克思主义批评、庸俗社会学派、现实主义批评、形式主义理论与批评等，曾同时活跃于文坛。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执政党指导思想的时代条件下，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考察文学现象，是一些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共同的努力方向。但是，只有卢那察尔斯基等少数人真正有所建树，成为革命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杰出代表。庸俗社会学理论的信奉者们以及“拉普”的批评家们，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是他们却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了，在理论观点和批评实践上都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庸俗社会学派、“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的文学观，是十月革命后至1920年代极“左”文学思潮的集中的理论表现，又同1930年代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把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政治化倾向相联系，成为1930年代至1950年代初极“左”文学政策的理论基础。

现实主义批评在这一时期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仍然取得了进展。高尔基和文学批评家沃隆斯基、作家扎米亚京等人一起，在各自的文学批评活动中，顽强抵制极“左”思潮对文学的戕害，为捍卫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不懈努力，为现实主义在1950年代初期以后的回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铺垫。

俄国形式主义是十月革命后至1920年代一个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批评流派。这个学派在革命前即已出现，主要由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彼得格勒诗歌语言研究会的一部分学者组成。形式主义学派在研究文学作品的形式、文学的特质和规律的过程中，运用的一些独特方法、提出的一系列独到见解，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天地。这一学派虽然先后两次遭到集中批判，在国内文坛很快走向消解，但却由于雅克布森等代表人物向国外（布拉格、巴黎等地）的迁移，带动了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革命性

变革。

进入 1930 年代以后,随着个人崇拜的形成与泛滥,俄罗斯本土文学的发展进入了由多元化格局转变为一元化格局的历史时代。文学理论与批评随着整个文学生活的演进经历了相应的变化,也进入了一个从总体上看是暗淡的时期。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作家和文学创作实行一统化控制的结果是各种文学团体思潮、运动和流派荡然无存。作家们有的不得不强行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有的被迫收敛讽刺和批判的锋芒,有的事实上失去了进行艺术创作的可能性,有的遭到迫害和清洗。文学创作中的“优秀作品率”明显降低。在理论批评领域,以扣帽子、打棍子、政治宣判为特点的讨伐性批判横行一时。日丹诺夫主义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在一个长时期中几乎完全失去了自由表达的可能性,除了日丹诺夫式的指责和谩骂之外。

在俄罗斯域外文学“第一浪潮”中,文学理论与批评不仅与白银时代已有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成果相衔接,还在不同程度上吸收西方文艺理论思潮的成果而有所创造,显示出另一种演进趋势,构成域外文学“第一浪潮”的一部分重要遗产。处于“第一浪潮”中的作家和诗人们在不断推出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的同时,也和批评家们一起,贡献了包括文学批评文章、文学理论著述、书刊评论、作家评传、文学研究专著、文学史著作等多种形式的文学批评成果。流亡国外的俄罗斯思想家、哲学家、艺术批评家、文化史家等人文学者,在他们的各类论著中也往往论及文学问题,显示出观照文学现象的独特视角,同样丰富了俄罗斯域外文学批评。

活跃于俄罗斯域外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的主要有三类人:一是专门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批评家、文学史家和学者,如艾亨瓦尔德、彼·米·比策利、阿·贝姆、马克·斯洛尼姆、格列勃·司徒卢威、德·彼·米尔斯基、谢·马科夫斯基、康·瓦·莫丘尔斯基等人;二是兼及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哲学家、思想家,如费·斯捷蓬、别尔嘉耶夫、伊万·伊里因等;三是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学批评文字的作家和诗人,如阿达莫维奇、布宁、列米佐夫、霍达谢维奇、扎伊采夫、茨维塔耶娃等。事实上,流亡在外的俄罗斯人文知识分子中,完全不涉及文学批评的人是极为少见的。整个俄罗斯域外文学“第一浪潮”的理论批评成果是如此丰厚,以致有的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域外文学“第一浪潮”对于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贡

献主要在于“非想象性文学”（*не-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方面。^①域外文学批评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关于俄罗斯古典作家的研究；对于白银时代文学的评说；对于同时代俄罗斯本土文学，即苏联文学的评论；关于俄罗斯域外文学的地位和出路的讨论，等等。

上述现象的出现具有某种必然性。一方面，在俄罗斯文化和文学史上，特别是在白银时代，文学、哲学、艺术的彼此交融，曾经构成一种独特的景观。深受白银时代思想文化浸润的流亡知识分子，不辱使命，继往开来，使这种交融在域外俄罗斯文化和文学中得到了延续。另一方面，身处域外的俄罗斯作家、学者和批评家们所共同关注的，不仅是自身的文学语境、文学活动的意义与文学命运，更有整个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现状和前景。这正是俄罗斯域外文学与本土文学紧密相连的生动表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一代俄罗斯流亡作家、批评家的文学批评活动仍在继续，但域外文学“第一浪潮”却开始走向终结。从那时开始兴起的域外文学“第二浪潮”既未能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提供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也未能提供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国外俄罗斯文学批评的主要成果，是由第一代流亡文学家所创造的。

时至1950年代初，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长期沉闷的空气被打破了，社会思潮迅速活跃起来。1954年，在白银时代即已步入文坛的老作家爱伦堡发表小说《解冻》，新的文学思潮也随之开始涌动，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相继出现，把俄罗斯本土文学带入了一个广阔的新阶段，即通常所说的当代文学阶段。文学批评也开始突破日丹诺夫主义的钳制，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开始回归。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由此进入它的当代阶段。

本书着重论述1890—1950年代初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即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的前半段，勾画出这一阶段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演进轨迹，论及这60年间俄罗斯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重要成果，并予以扼要评说，致力于发现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批评的主要成就与基本特色，以求揭示各派理论与批评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意义、地位和影响。

^① Струве Г.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изгнании.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бзора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2-ое издание и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Париж. YMCA-Press. 1984, с. 371.

目 录

前言	(1)
一 俄国象征主义文学批评	(1)
象征主义理论批评的发端:弗·索洛维约夫——梅列日 科夫斯基——勃留索夫——勃洛克——维·伊万诺夫——别 雷	
二 宗教文化批评	(44)
俄国宗教哲学与宗教文化批评——罗赞诺夫——舍斯托 夫——谢·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上)	
三 白银时代作家和诗人的文学批评	(85)
印象派批评——阿克梅派文论与批评——未来派的语言 学诗学——高尔基的文学批评(上)——安德列耶夫——魏 列萨耶夫	
四 白银时代专门批评家们的建树	(104)
格尔申宗——艾亨瓦尔德——伊万诺夫——拉祖姆尼 克——楚科夫斯基	
五 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127)
普列汉诺夫——沃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列 宁——托洛茨基——布哈林	

2 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

六	1920—30 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	(175)
	高尔基的文学批评(下)——沃隆斯基——扎米亚京	
七	俄国形式主义与巴赫金	(195)
	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雅各布森——巴赫金	
八	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	(225)
	庸俗社会学及其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 “拉普”的文学观	
九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239)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日丹诺夫主义——“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	
十	域外俄罗斯文学批评家们的贡献	(263)
	谢·马科夫斯基——贝姆——德·米尔斯基——莫丘尔 斯基——阿达莫维奇——斯洛尼姆——格·司徒卢威——从 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到奥楚普	
十一	域外俄罗斯诗人和作家们的文学批评	(307)
	布宁——列米佐夫——扎伊采夫——霍达谢维奇——茨 维塔耶娃——奥多耶夫采娃和别尔别洛娃的文学回忆录	
十二	域外俄罗斯思想家、哲学家们的文学批评	(338)
	别尔嘉耶夫(下)——费·斯捷蓬——从弗兰克到洛 斯基——伊万·伊里因	
余论		(363)
参考文献		(370)
附录 1	文学批评论著中俄文要目	(380)

附录2 文学团体和报刊中俄文名录	(416)
------------------------	-------

后记	(422)
----------	-------

俄国象征主义文学批评

俄国象征主义（символизм）作为白银时代文学中最先出现的新流派，在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从创作角度看，象征主义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诗歌走向衰微的情势下开始出现的。它似乎要作为一种抗衡和挽救的力量，努力把新鲜的话语带入诗歌中去，恢复诗的活跃的力量，复兴俄罗斯诗坛。从理论批评的角度看，象征主义则似乎是对实证主义批评、社会学批评的一种反拨。象征主义者不承认文学作品具有直接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他们要通过艺术创造，特别是诗歌创作来暗示某种哲学思想、宗教观念或文化意识，倡导并建立一种新的文明，促进人的精神完善。从俄国象征主义的先驱弗·索洛维约夫，到包括梅列日科夫斯基、勃留索夫、维·伊万诺夫和安德烈·别雷在内的两代象征主义者，都留下了各自的理论批评著述。这些著述不仅构成了俄国象征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成果，而且是整个白银时代文学批评建树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国象征主义的产生，与西方哲学美学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与美学有着明显的联系。康德的不可知论与“美不涉及欲念和利害”的观点，谢林关于“理智直观在诉诸直接经验时就变成了艺术中偶发的美感直观”的理论，席勒把拯救人类精神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审美活动上的思想，都给俄国象征主义者以直接的影响。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著作中所蕴含的对生命本体的意义、对人的精神意志的作用、对艺术的起源与本质的看法，瓦

格纳的以“音乐精神”统摄各门艺术乃至整个世界的主张，更为俄国象征主义者所摄取。但俄国象征派又断然否认自己只是西欧象征派的变体或移植，而是认为其根源就在以普希金为先导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特别是俄罗斯诗歌中。如普希金的诗神与宗教世界的和谐与融合，诗人关于历史与人的痛苦的沉思；莱蒙托夫诗歌中的“恶魔”主题；莱蒙托夫、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灵魂的双重性和个性痛苦之根源的揭示，都直接影响了象征派艺术探索的范畴与指向。而丘特切夫和费特对“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之神秘关系的叩问，对理智、信仰、记忆、直觉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复杂联系的探测，以及他们试图触及“一切秘密的秘密”“至高无上的事物”的努力，则对象征派美学原则的确立有着明显的启示作用。可以说，19世纪俄罗斯诗人和作家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创作中的某些因素，已为俄国象征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俄国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开始萌动于19世纪80年代。弗·索洛维约夫、明斯基等人率先亮出一种新的文艺观，成为象征主义理论批评的发端。1893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发表《论现代俄罗斯文学衰落的原因与若干新流派》，被视为象征主义运动的宣言。象征派的艺术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也在90年代形成潮流。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俄国象征主义无论在诗歌与小说创作方面，还是在理论批评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显示出一派鼎盛期的景象。彼得堡与莫斯科是俄国象征派的两大集结地。在彼得堡，聚集着明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济·吉皮乌斯、沃伦斯基、索洛古勃等人。他们先后以《北方导报》（1885—1898）、《艺术世界》（1899—1904）、《新路》（1903—1904）等杂志为阵地，把艺术与哲学—宗教探寻结合起来，宣扬所谓“新宗教意识”，强调艺术的宗教底蕴。这一批象征主义者与罗赞诺夫、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舍斯托夫那一派哲学—宗教思想家最为接近。

俄国象征派在莫斯科的代表人物有勃留索夫、巴尔蒙特（1867—1942）、巴尔特鲁沙伊蒂斯（1873—1944）等。这一派掌握着天蝎出版社（Скорпион，1900—1916），出版《天秤》（1904—1909）、《金羊毛》（1906—1909）等杂志和《北国之花》（1901—1905，1911）等丛刊，强调象征主义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是语言艺术在其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他们所致力的是真正复兴俄罗斯诗歌艺术。

1910年，有别于上述“老一代”象征主义者的“年轻一代”象征派

鲜明地显示了自身的存在。是年，维·伊万诺夫先是在莫斯科，后又在彼得堡作题为《象征主义的遗训》的报告，得到勃洛克和别雷的赞赏与支持。伊万诺夫认为象征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发挥其法术般的驱逐鬼神的作用，“改造生活”，“建设生活”。在别雷看来，象征主义则是一种世界观，它变革生活，创造“新的生命形式”。以上述三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象征派迅速形成。在此之前，伊万诺夫已于1909年春发起组织“诗歌研究会”，随后又扩展为“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于1907年建立旨在与天蝎出版社相抗衡的季节女神出版社。《金羊毛》杂志在1907年以后已开始表现出“年轻一代”象征派的倾向。设在彼得堡的《阿波罗》（1909—1917）杂志，设在莫斯科的《工作与时日》（1912—1914）杂志和“缪斯革忒斯”（Мызарет）出版社，更是“年轻一代”象征派的直接喉舌。

两代象征主义者之间发生的争论，既是俄国象征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表征，又是这一运动自身的追寻方向发生变化与分歧、队伍出现分化与重新组合的标志。两代象征主义者的理论批评与创作活动均未就此停止，而是在不同的方向上继续发展。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曾出现过象征主义的再度繁荣。直到1917年以后，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和文学运动的象征主义，才逐渐走向消解。

俄国象征主义的思想先驱是19世纪杰出的哲学家、政论家、诗人和批评家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53—1900）。他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诗书之家，父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1820—1879）。他于187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1874年通过了题为《西方哲学的危机：驳实证论者》的硕士论文答辩，1880年又通过以《抽象原理批判》为题的博士论文答辩，曾先后任教于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及别士图热夫女子高级讲习所。自70年代末结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后者的创作及宗教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广泛涉猎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斯宾诺莎和叔本华等人的著作，也迷恋本国哲学家尤尔凯维奇（1826—1874），热衷在哲学与宗教神学领域中遨游，但并不放弃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1881年3月，他就沙皇政府因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而采取镇压措施一事发表演说，力主废除死刑，因而被解除教师职务，此后则完全投身于研究与著述工作，对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哲学、宗教与文学，都产生过重大

影响。

弗·索洛维约夫接受了柏拉图关于存在着“两个世界”的学说（двоемирие）并加以发挥，认为现实世界、此岸世界和“理念”世界、彼岸世界共存，而且后者是更为高尚的、完善的、永恒的；尘世的现实只是彼岸世界的一种反映，一种被歪曲的类似物。如果说彼岸的“理念”世界是“神的其他物”，那么，此岸的现实世界则是脱离上帝、陷于罪恶的结果。索洛维约夫呼吁人们摆脱世俗的羁绊，接近永恒的彼岸世界。这种“两个世界说”成为象征派诗人艺术探索的思想基础。象征主义者把诗人说成生命秘密的发现者，认为诗人有接近彼岸世界的能力，有领悟彼岸世界并在艺术中加以表现的力量，而艺术中的“象征”正是这种“接近”与“领悟”的方法和手段。

索菲亚（София）学说在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索洛维约夫的学说中，索菲亚是理想中完美的人，是神智慧的最高表现，上帝就是把索菲亚作为造物理想的根基的。索洛维约夫赋予索菲亚以多重的甚至无所不包的意义。他认为，就其实质而言，索菲亚是表现出来的得到实现的理念。作为神的世界观念之体现的唯一核心，她是世界的灵魂。作为女性个体，她体现在圣母马利亚的形象中。作为献身于上帝而又从上帝那里获得自己的形式的一种被动本原，她则是一种“永恒的女性”。在索洛维约夫那里，对索菲亚的崇拜就是对理想人类的崇拜，对索菲亚的幻想就是对神妙的宇宙之美的幻想。

在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体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有“万物统一”（всеединство）的思想：整体和部分、一般和个别、内部和外部、精神和物质的统一。达到了这种“统一”，便是实现了“完善”。但噩梦般混乱的现实世界却阻碍着人们实现达至完善的愿望，人世间的兽性时而占据上风，反基督者往往得意非凡。索洛维约夫认为，要拯救人类，恢复对于“上帝的力量”的信念，就必须实现和“世界的灵魂”相融合，这灵魂就是索菲亚——“永恒的女性”，也即把尘世生活与神灵世界，把美与爱联系起来的以“永恒的温柔”为特点的女性气质。艺术创作在人类接近这一高度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它是“神灵创造的尘世类似物”^①，排

① Смирнова Л. А., Чалмаев В. Г. и др.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Очерки. Портреты. Эссе. В 2 ч. Ч. I.*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4, с. 62.

除了理念与感情、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索洛维约夫从他的“新基督教思想”出发提出的这种把艺术与宗教结合起来、通过这一结合来“医治”和拯救人类的思想，也对象征派艺术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索洛维约夫的美学思想和他的宗教—哲学思想紧密相连。他的主要美学论著是《艺术的一般意义》(1890)和《自然界的美》(1899)。他把美视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力量，认为美是作为改变和照亮物质（通过显现包含于物质中的超物质的因素和绝对的“万物统一”的理念）的结果而显示自身的。“显现出来的理念”“圣洁的（被照亮的）实体”——这便是美的最一般的定义。索洛维约夫指责那种失却美的本体论基础的“美学的分离主义”，并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的现实主义”看成“走向实证论美学的第一步”^①。同时他又赞同关于美“不关涉利害”的形式主义解释，因为在他看来，美绝不是一种可以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装置或工具，而是世界秩序的目的。艺术之宗旨的实现过程就是整个世界的过程。由自然开始的艺术事业不是人类艺术可以复制、反映和继续的，后者只是促进前者的完成。

索洛维约夫认为，完善的美是不朽的，但自然界的和“尘世中的”美，不过是遮盖在混乱和“罪恶的”生活之上的一种覆盖物，这种生活是依照彼此隔绝、互相压迫的法则运行的。作为既是自然的又是有意识的精神存在的人，其“中介的”义务就在于，一方面认识、归纳抽象的美，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把“尘世之美”从不断的破坏之中拯救出来，并将其引向永恒的序列。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索洛维约夫为艺术设定了双重使命：从广义上说，艺术是一种“驱逐鬼神的法术”（теургия），这也就是艺术把现实改造和转化为绝对美的理念——实体宇宙的生活实践层面的宗旨，这一见解和认为完整的人类生活应当是艺术的主张彼此一致；从狭义上，也即从专门的意义上说，艺术的使命则在于以片断预言的形式预示“完全的万物统一”。索洛维约夫写道：“对于任何事物和现象从其终极状况的视角，或从未来世界来看所作的任何具体可感的描绘，都是艺术作品。”^②他认为艺术家应当为“完善的美”效力，并且只有如此才能为善与

① См.: Соловьёв В. С.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 х томах. Т. 7. С - Петербург: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12, с. 149, с. 69 - 77.

② Соловьёв В. С.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 х томах. Т. 7. С - Петербург: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12, с. 149, с. 85.